

疫苗的技術政治

口述作者 ■陳宗文 /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文字整理 ■林品君 /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疫苗的研發是否能滿足我們對於回歸「正常」的期盼？新冠肺炎病毒（COVID-19）的爆發，使許多人的計畫改變或步調停下，諸如公司裁員、出國讀書暫緩等等。儘管人們皆期待疫苗的到來能使一切回歸「正軌」，但一旦我們將疫苗定位為救世主般的存在，失望的可能性也極高。社會學或許能帶我們從另一視角看待疫苗的技術效應，進而釐清疫苗的政治意涵。

「疫苗的政治性」體現在人群接種量

我們對於疫苗通常抱持單一的想像，將其視為預防感染性疾病的解方。不過這樣的認識很危險，因為疫苗有很複雜的機制。光是疫苗種類即有很多種，如針對病毒、病菌造成的傳染性疾病，甚至是因感染而引發的慢性疾病，都有不同的疫苗對應。這次新冠肺炎病毒主要感染器官為肺，B型肝炎則是感染肝。疾病的發生機制不同，疫苗也會不同，因此，我們不能把疫苗當作完全相同的東西理解。疫苗更可區分為預防症狀、減緩症狀，還是治療

已感染之症狀。由此可見，疫苗可以很分歧、多元，機制非常複雜。我們不該想像疫苗＝預防＝有效。疫苗作為一種防疫機制，它能做到什麼程度、使用條件，都需要小心處理，甚至除了疫苗外，是不是有其他防治方法也是我們應該考量的。

若以疫苗作為疾病預防的防疫政策，那麼政府的訂定細節非常複雜。一方面，須考量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另一方面，疫苗亦需有足夠的供應量及相應的接種措施支撐；再者，民眾該疫苗的信心程度亦需納入考量。今年發生的新冠肺炎疫情，人們對於疫苗抱持著「只要疫苗出來就能解決問題」的想法或認識，反而不一定能讓疫苗真正產生它的效果。

有關疫苗有兩件最重要的事：一、對個人：它能让身體產生免疫效果，接種疫苗後接觸到病毒或細菌，它不會對人體造成嚴重傷害；二、對國家：國家制定防疫政治，主要考量的是群體免疫（Herd Immunity）。公共資源投入在疫苗接種，需要有足夠高比例的人接種，才

可能達到群體免疫的效果。這即是技術物政治性的體現。有足夠多的人接種，病毒在人群中擴散的可能性降低，才能達到阻絕擴散的機制。政治性即表現在數量級上，取決於人群疫苗接種的比例。個人只要做好個人防護就好，但從社會來看，疫苗還需要解決足夠量的人群，否則病毒仍會在人群中擴散。因而，達到一定程度接種數量是疫苗能夠被社會採用的條件。若不能達到一定數量，即無法達到保護群體的效果。

疫苗或許意謂生命政治，但不必是唯一理解角度

疫苗其實就是生命政治的展現。政府如何透過某種治理工具，讓治理的對象得到安全的保障，而且那個工具的使用是合理的。政府購買疫苗需要說服民眾疫苗是有效的，而且前提是疫苗也的確是有效的。

生命政治原本意涵是為了保障一個社會的生產力。若以較具批判性的看法出發，檢視是誰在關心疾病擴散的問題？為什麼需要大費周章地來治理人們？理由之一是那些仰賴人們生產力的現代治理者開始在乎人們的生命，因為人群需要健康地活著才能不斷地生產或再生產。不過，這是比較理論性的主張。不見得每個人都會想從這種角度來理解，而這也不見得是所有人接受防疫政策的理由，因為另有些人是站在一種利他的精神來接受疫苗。

不過若從生命政治這個術語來看，它確實是反應我們社會中想維持經濟活動的積極作為。

疫苗乘載社會關係的恢復想像，但不需過度樂觀

社會關係是不斷由新加入的諸種元素相互建構出來的。我們有了貨幣就改變了經濟生活的方式，比如我不需要拿筆來換你的麵包了。疫苗亦是如此，它以技術物的角色介入我們的生活。你我都接種疫苗，我們在互動就不需要那麼緊張，不需要把自己封閉起來。這也是為何有些人會期待 COVID-19 疫苗的到來。我們期待到時能恢復到以前那種自由，與人毫無顧忌地互動狀態。當我們現在無法做到，就會期待有疫苗的接種，生活即可能恢復。可以說，疫苗承載著人們對於恢復和重建互動可能性的期待。

但是疫苗是很複雜的。我們過去對很多疾病都抱持很大的期待，最典型就是 AIDS。AIDS 疫苗研發非常久，但至今尚未完成，反而其他治療 AIDS 的方法能夠讓感染者維持相對正常的生活。人類歷史曾面對過很多疫病的威脅，但最終透過疫苗能解決的少之又少。最多的情況反而是人和疫病和平共處；換句話說，人們更多是試圖找到和病毒相容的共存方式，至於依賴真正疫苗來恢復正常生活其實是非常少數的現象。我不能說 COVID-19 沒有機會，也許是有，但是我們在想法上

可能仍得有些彈性。總之我們不需要把所有的期待都放在目前尚未有明顯結果的技術物上。

疫苗可能改變人們的生命想像，但是更健康或者更揮霍健康？

疫苗最早做出來當然是讓人們不會受到疾病的危害。顯然疫苗和維持良好的、健康的生活有關。這當然是種對生命的期待。我們有了疫苗，似乎讓我們對生命有重新的認識。但我必須要說，撇開疫苗不看，我們其實每天都在傷害我們的身體，比如不規律的生活、飲食、不良的習慣作為都在傷害我們的健康。我們有真正改變什麼？也許疫苗提醒我們珍惜生命，但其實這個提醒非常有限。它讓我們看到可能性擴大的一些東西，但有時候反而讓我們更揮霍我們的生命。當初 HPV 人類乳突病毒疫苗推出時，大家比較擔心這個疫苗的點在於，似乎人們會認為只要接種此疫苗，就可以放肆地過生活。某種程度，它也是反映我們對生命非常矛盾的價值觀：一方面人們通常怕死；一方面我們不斷地逼迫自己往死裡走。

各國政府的疫情作為需放在社會脈絡中看待

台灣政府面對疫情主要藉由技術物（如口罩、酒精），以及社會規範（如社交距離和人群規模限制）等來治理人民，台灣在這個部分爭議是小的，大多數人都接受，不接受還會鬧

上新聞。某種程度上，這反應出政府在做這件事，並不是一意孤行。它在相當程度也大概了解台灣社會當中對利他、利己的事情多半都會包容和接受，我們比較沒有考量個人權益受限的反抗權。不過，我們要從另一個層面來看，為什麼大家都偏向接受？是不是我們社會有種氛圍比較容易讓我們去採取一種退讓的精神，讓大家更好的姿態。在另一些社會中，這件事並非這麼理所當然。有些人抱持的態度是我寧願死，也要捍衛我基本的權利。

政府不管採取怎樣的治理作為，通常不會是無中生有，而多半都是建立在過往已有的做法，加以強化或適度調整，才有辦法在社會上持續操作。任何技術一定都會有一些基礎，如果沒有既存基礎，那也需要慢慢建立基礎，不會是一步到位的。例如，台灣疫苗的接種也不是疫苗進來就可以接種。我們過去有相當長期疫苗接種的制度建立，跨時超過半個世紀。奠基於這個制度，我們才有辦法順利使用疫苗。

每個社會都有自己累積下來的東西，而這些東西在不同社會中是不太一樣的。絕對不會有放諸四海皆適用的治理方式。因此，每個國家在應對疾病時，方式自然就會出現差異。這些差異多少反映出國家制度或體制的慣性。如果做了很劇烈或激進的扭轉，很可能造成很大的反作用力，其實反而不會產生期望的

效果。

集體和個人自由儘管有時衝突，但不能武斷二分

我不覺得集體和個人可以直接二分，因為它們有著非常綿密的關係。集體的權力有部分來自於個人願意退讓自己一小部分的自由而換取的；反過來說，集體自主性也相對地拉出距離空間保障了個人自由。確實它們在一些地方會發生衝突，但不能將其硬生生拉開來理解。我們需要檢視發生衝突的那些地方，揭露它使其被觀看到，使其成為問題，而問題需要被解決。有時候我們常會落入到為反對而反對，因為某件事侵犯到個人權益而僵持不下，但過程中其實缺少了很多面對現象的理解，以至於演變到無法解決的僵局。但其實，問題本身更需要我們抽絲剝繭，把其中的歷史文化、社會機制、權力關係、技術的政治性一一檢視，才有辦法看清楚衝突的源頭。我們絕不能把問題簡化、切割為個人和集體的兩端。

免疫的社會功能和目的是維持社會安全

免疫的概念不僅用在病毒或細菌，也可以用在相反的疫苗本身。我們的社會不僅是要對病毒免疫，其實政府也希望社會對疫苗免疫。對病毒免疫是指，病毒不會危害到這個社會；對疫苗免疫則是，疫苗不會危害到這個社

會。假若疫苗在社會上成為引起爭端的對象，那它就是破壞了這個社會。諸如，社會有沒有針對疫苗安排預備措施，安全技術是否足夠安全，會不會使社會恐懼等等都是要考量的點。更進一步說，是否有客觀機會不需打疫苗就可以免疫。2008年H1N1的流感疫苗後期，其實對社會造成很大的衝擊，但它並不全是壞事，因為它也讓我們建立疫苗接種的救濟制度、安全審查、管制規則等相關的基礎設施。



作者簡介

陳宗文教授為巴黎高等政治學院社會學博士，目前為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其研究專長主要為科技社會學、組織社會學、經濟社會學、視覺社會學、法國社會思想與理論。陳宗文教授於2019年獲得科技部研究獎勵，政大學術研究優良獎，亦多次獲得優良教師獎。相關著作可見《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An International Journal》、《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Vaccine Research》、《歐美研究》、《臺灣社會學刊》等諸多專業學術期刊。